

## 第二章 《金锁记》与《画中情思》女性形象比较

### 第一节 曹七巧与吉拉蒂的身世比较

曹七巧与吉拉蒂是两个身世地位不同的女性。在小说中，前者是来自少钱没势，社会地位低微，被人看不起的开麻油店的小生意人家；而后者是出生在泰国有钱有地位的公王贵族之家。虽然后来吉拉蒂的家庭没落，但这种世袭的贵族身世还是比一般的平民百姓要有身份和地位。小说中曹七巧和吉拉蒂所具有的不同身世，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她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人生哲理、思想情操和爱情婚姻，以及待人接物与处事方法。

通过比较张爱玲和西巫拉帕作品中女主人公的不同身世，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她们各自不同的身世对她们婚姻生活的影响，也可以看到这也是造成她们不同悲剧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

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对曹七巧的身世的描写是通过两个小丫鬟的对话而透露出来的。张爱玲的这种创作手法显得自然、有生活气息和具有故事性。小说是这样描写的：

小双道：“告诉你，你可别告诉你们小姐去！咱们二奶奶家里是开麻油店的。”凤萧哟了一声道：“开麻油店！打哪儿想起的？像你们大奶奶，也是公侯人家的小姐，我们那一位虽比不上大奶奶，也还不是低三下四的人——”小双道：“这里头自然有个缘故。咱们二爷你也见过了，是个残废。做官人家的女儿谁肯给他？老太太没奈何，打算替二爷置一房姨奶奶，做媒的给找了这曹家的，是七月里生的，就叫七巧。”<sup>[1]</sup>

曹七巧的这种身份使她在姜家处于一种不仅被姜家人看不起，而且也被姜家的丫鬟看不起的处境。为了冲破这种低微身份使她在姜家中倍感在精神上和物质上所产生的无形压力的罗网，她挣扎和反抗。虽然她在姜家没有多少地位和话语权，但她常用她可以支配的嘴来发泄她的不满和冤气。她的牢骚，风凉话和言不

<sup>[1]</sup> 严家炎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精选》（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547-548页

由衷的话语都是通过她的嘴，这个有力的“武器”——唇枪舌剑来抵御、反击和化解各种对她的不敬、歧视、指责和冷嘲热讽。

另外，在张爱玲的笔下，我们还可以看到曹七巧的这种低微的身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她爱情和生活中悲剧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曹七巧之所以被嫁到姜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不是出身在有钱有势的富贵人家。用曹七巧的丫鬟小双的话来说，让一个女人嫁给一个残废的人“做官人家的女儿谁肯给他？”曹七巧这种低微的出身直接影响到他的爱情和婚姻。正因为她的身份和地位，在封建社会里她只能是封建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曹七巧认为“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然而，她对爱情的渴望和对自主婚姻的追求在封建社会里是难以实现的。

由于曹七巧不是出生在有钱人家，她在姜家遭受歧视的处境，使她有一种逆反的心态。她那似刀子般能割人的舌头，讲出话来常常让人受不了，就是姜家的人也得让她三分。十年媳妇熬成婆。十年后，曹七巧在丈夫和婆婆相继去世后，使她得到了一笔家产，对于这笔用她十年的青春和不幸的婚姻所换来的钱财，她是紧紧抓住不放的，生怕被别人骗了去。她认为有了钱，有了一家之主的地位，似乎就使她摆脱了以前低微的身份。曹七巧认为，她要出人头地，她要让人看得起，她就必须有钱。

由于无钱无势的地位，让人瞧不起的身世，使曹七巧在姜家受尽了歧视。她要翻身，她要有钱，这种心态也使她在金钱和爱情之间最后选择了前者。她的生活经历使她认识到没钱就没有爱情和美好的婚姻。但是等她有了钱时，她却失去一个女人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和对美满婚姻的憧憬。在曹七巧看来：“这半辈子已经完了——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不讲理。”<sup>[1]</sup>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张爱玲的描写中看到曹七巧低微的身世也给她在对待自己子女的婚姻上造成了阴影。以前由于曹七巧家境贫寒，才被媒人选中被嫁到了姜家。而今她有了家产，有了钱，她也要她的儿子和女儿找个有钱有地位的人。当有人替她女儿长安做媒时，“若是家境推板一点的，七巧总疑心人家是贪她们的钱”。<sup>[2]</sup>曹七巧不仅把自己儿女的婚姻与身份地位联系起来，而且更是与自己的手中的金钱联系起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自从她被嫁到姜家后，曹七巧的低微身世就一直是她心上的一块阴影。她的爱情，她的婚姻，她的儿女，她的家产钱财等无不受到她身世的影响。这种影响给她带来的多是痛苦、无奈、怨恨、逆反、报复和悲情。

<sup>[1]</sup> 严家炎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精选》（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559页

<sup>[2]</sup> 严家炎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精选》（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563页

与《金锁记》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不同，西巫拉帕在《画中情思》中所刻画的吉拉蒂的身世虽然高贵，家境富裕，但这也没有给她带来美满的婚姻和幸福的爱情。吉拉蒂的贵族身份和良好的家庭环境反而给她带来了情感上的无尽痛苦和婚姻上的无奈。她的家庭背景，周围环境，本身的性格和传统思想都成了束缚她思想开放，独立自主，冲破传统礼教的勇气和力量。

吉拉蒂的贵族身世使她不用像曹七巧那样，在婚前要靠自己的辛劳和做生意来生活。吉拉蒂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她父亲把她“禁锢在他的世界里”，不让吉拉蒂“和外界发生联系。当时她在以前的王宫里跟一位西洋老太太读书。这位老师整天讲的是“功德”，“贤妻良母”这类的东西。吉拉蒂说：

我整天在王公贵族中间周旋，甚至都没有机会去想，对于一个女人来说，青春意味这什么，以及怎样不把青春年华白白虚掷。<sup>[1]</sup>

吉拉蒂一直生活在无忧无虑之中，直到她的两个妹妹相继结婚后，她“才开始感到自己要成为一个不幸的人”，妹妹的结婚和幸福生活对她的刺激很大。当时她已有 29 岁了。虽然吉拉蒂长得很美，在“对自己容颜珍爱和维护程度是大多数女人所赶不上的”，但在吉拉蒂的生活范围中，没有与她有过情感交流的年轻男性的身影。与张爱玲所刻画的曹七巧不同，她在婚前从事卖麻油的生意，在柜台前招呼和接触各式各样人物，包括男女老幼，三教九流，与外界有着多种联系，而吉拉蒂却“过着幽禁的生活，完全被排斥在现实生活之外，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

吉拉蒂生活在王室家庭，使她成为家里的大家闺秀。在吉拉蒂的心里不是没有对爱情这个“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的赞美。她也和所有的人一样对爱情和婚姻抱有幻想，“也想谈论和亲身去体验一下那个新的世界里的生活”。但是吉拉蒂所处的家庭，特别是她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和父亲的严加管教，把她变成了一朵温室里的鲜花，在岁月中慢慢地消磨和枯萎。

吉拉蒂的这种身世和家庭生活使她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度过了整整三十四年。她的父亲给她介绍了他的老朋友昭坤，一个 50 多岁丧妻的男人，希望吉拉蒂能和他结婚。虽然他的父亲没有强迫她，但她为了摆脱寂寞的生活，最终在反复考虑后决定嫁给了昭坤。婚后她“总算有了一点应得的幸福，尽管并没有得到爱情”。如果说曹七巧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因为她的身世低微，由媒人介绍和她自己也想见到她相恋的人，才答应嫁给了有残疾的姜家二少爷的话，那么吉拉蒂没有

<sup>[1]</sup> 西巫拉帕：《画中情思》，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年 4 月第 1 版，第 47 页

爱情的婚姻却是因为她高贵的身世，“与世隔绝”的生活和年龄不饶人的困境，在他的“媒人”爸爸的劝导下，迫使她为了得到一点婚姻的幸福，才不得不同意嫁给她所不爱的昭坤的。

由于吉拉蒂王室的身世和美貌贤惠，当她遇到了对她表露爱情和她也心仪的知己年青男友诺帕朋后，终于使她有了她自己所爱的人。但由于她是有夫之妇，不能违背传统礼教和道德规范，她强迫自己与这种“姐弟恋”保持一定的距离。正是吉拉蒂所生活的家庭环境和所受到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使她不能大胆地去追求和她所爱的人，去勇敢地冲破传统礼教的层层罗网，这也就为她以后的悲剧埋下了种子。

在身世对婚姻的影响方面，曹七巧是以低微的身世嫁到有钱的大户姜家的，从有爱嫁给无爱，从缺金熬到有金，从无地位变成有地位。她在以自己的青春和无情无爱的婚姻换来了一笔钱财后，认为爱情对她来说已不再有了。她的“情”完全被“金”给被牢牢地锁住了，从而走完了**从情“锁”婚到金“锁”情**的悲剧一生。

与曹七巧不同，吉拉蒂出身王室，嫁给了有钱有地位、丧妻不久的五十岁的男人。她在无爱的婚姻中遇到了有爱的婚外情，但她因为自己的年龄、已婚身份和传统思想，在表面上拒绝了这个婚外情。最后她在不断压抑和涌起的爱情漩涡中把自己埋葬了。吉拉蒂从无爱到有爱，从无情有情，从而走完了**从情“锁”爱到爱“锁”心的悲情一生**。

## 第二节 曹七巧与吉拉蒂的处世比较

在张爱玲和西巫拉帕的笔下，曹七巧与吉拉蒂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在不同的国度里受到不同的宗教文化和传统道德思想的影响，她们各自的身世和生活经历使她们在思想意识，待人接物，文化修养和对待恋爱婚姻上有着很大的差别。她们不同的处世态度通过小说中的不同情节生动地反映出来。比较分析作品里中泰女主人公对待爱情婚姻，家庭与钱财等方面的处世态度，可以使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来解读张爱玲和西巫拉帕在各自作品中所刻画的女主人公的性格、人品、教养和思想意识。

曹七巧和吉拉蒂都是生活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女性。她们在爱情和婚姻上都是不幸的。她们的不幸和悲剧的产生和发展，也可以从她们不同的处世态度中反映出来。在张爱玲的《金锁记》中，我们看到曹七巧的处世态度和思想意识与西巫拉帕《画中情思》中的吉拉蒂有着明显的不同。

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性。她泼辣、有心机，口无遮拦，

心直口快，嘴尖舌辣，冷嘲热讽，能见风使舵，见机行事，看什么人说什么话。她的这些待人接物的本领和处世的方法，与她的身世和在麻油店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小说在一开始通过丫鬟嘴里说到曹七巧的时候，就已给人一种人未出而形先现的感觉。她的为人处世，见钱眼开的品性就已跃然纸上了。

小说在描写曹七巧第一次露面时就能让人看到她的处世为人。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当大家要去给老太太请安时，曹七巧却没出来。原来，由于曹七巧的低微身世而在姜家被人看不起，她被迫要陪着患有骨痲的丈夫，过着没有一点儿生活情趣和病态的婚姻生活，这她在身心上必然产生心理和身心上的压抑，为了舒缓她的精神压力和郁闷的心情，她染上了每天抽大烟的习惯，以此来解闷儿，所以在每天早上给老太太请安时迟迟不见她的身影。她这种我行我素，连给老太太请安这种在中国传统大家族中的礼数，都要让位于她的意愿。

后来，曹七巧终于出来了，但她一出现不是像一般大户人家的媳妇那样毕恭毕敬，举止端庄，说话温和。而是一亮相就把她那张扬的个性和处世行为给展露了起来。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

榴喜打起帘子，报道：“二奶奶来了。”兰仙云泽起身让座，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着腰，……四下里一看，笑道：“人都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摸着黑梳的头！谁教我的窗户冲着后院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sup>[1]</sup>

曹七巧本来是自己在屋里抽大烟来晚了，却找个理由把自己在姜家受排挤被小看的不满情绪借机发泄出来，这样一来，她来晚了，不但无过反倒有理了。曹七巧善于见机行事，一有机会就会把自己在姜家的冤气给发泄出来，这种处世方法充分表现了曹七巧的品性。曹七巧这种待人处事的做法，与她以前在麻油店做生意，整天面对各种人物，招呼四方来客，见机行事有关。这种生活经验和体验对曹七巧在社会上如何待人接物不能不是一种磨练。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种看菜下饭的处世方法，是从麻油店里出来的曹七巧经营之道。曹七巧自己也知道她在姜家是被人瞧不起的，因此她和新来的人分外

<sup>[1]</sup> 严家炎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精选》（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549页

亲热，以笼络人心。比如对新来姜家的三妹兰仙的做法就是那样。她一反过去对人说话尖牙利齿的态度，对兰仙却是找好话说。可兰仙就是不给曹七巧这个人情，她“早看穿了七巧的为人和她在姜家的地位，微笑尽管微笑着，也不大搭理她”。

在对待家人如自己的亲哥哥上，我们也能看到曹七巧的为人。当她的哥哥来看她的时候尽管她有一些不乐意，认为他们来看她是因为要她的钱。但终归是自己的亲哥哥，生活上并不宽裕。她又因他哥嫂的贫穷生活而暗中流泪，表露出她心灵深处的人性和怜悯，由于情亲和人情的关系，曹七巧在送她的穷哥哥走的时候，她还是送给她的哥嫂不少东西和钱财。

另外在待人接物上，曹七巧一方面对看不起她的姜家人用唇枪舌剑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自己在姜家的地位和争取自己的权益，也会笼络人心，说些口是心非的好话来。

在对自己的爱情婚姻上，她一方面为了能见到自己所中意的人，可以违心地嫁到姜家；另一方面在金钱和情爱的天平上，当情爱被岁月和无奈所消磨后，又表现出对金钱的渴望、追求和紧抓不放，把钱财放在了最重要的地位。不管是旧情人还是自家人，不管是自己儿女的男朋友还是自己的哥嫂，都不能动摇她对钱财的控制和占有欲。

曹七巧在小说中第一次露面给人的是一种大大咧咧，不顾举止，借机发泄的怨妇形象。而吉拉蒂第一次出现的时候给人的却是一种温文尔雅，知书达理，说话得体，端庄美貌的贵妇人形象。小说中描写诺帕朋在没有见到吉拉蒂时，他揣测吉拉蒂的为人和处世之道时认为“说不定她待人傲慢，至少是很会摆皇族架子的。……她大概很严肃，像有些人那样，不拘言笑，不爱热闹。她很可能是个慢条斯理、循规蹈矩的人。”而当她第一次见到吉拉蒂时，吉拉蒂给他的却是一种颇具风韵，神态优雅，亭亭玉立，气度非凡，彬彬有礼，谈吐文雅的印象。

在诺帕朋看来，尽管“吉拉蒂很清楚人们对她的态度，尽管表面上还是那么温柔、文静，但谁也不难看出她的内心的欣喜和总是挂在脸上的淡淡红晕”。吉拉蒂这种性格和待人接物的举止，构成了她的基本处世之道。不管是对长者还是对年青人，不管是对自己的家人还是对外人，吉拉蒂都能以宽容和大度态度去对待，尽管自己受到了莫大的精神打击和疾病的折磨，她总是能在经过一番心里的煎熬后，淡定从容地加以面对。这同曹七巧那种眼里容不得沙子，受到别人歧视后就会想方设法加以反击，发泄自己的不满和冤气，口无遮拦，总是爱给人以颜色看的处世态度完全不同。

曹七巧与吉拉蒂处世之道的不同，是与她们各自从小到大所受到的社会和家

庭的影响分不开的，是符合她们各自的身份和地位的。曹七巧出身低微，出嫁前要为生活而辛劳奔波。嫁到大户姜家后她又被大户人家歧视，她不能长期忍受这种被人看不起和无爱的婚姻，所以她要发泄不满，要挑战这个大户家庭，要争取自己在这个大户人家中的地位，应得的家产和利益。曹七巧一方面要应付这个大户人家中的人，另一方面又要关照自己的家人和其它各方人物。如果没有那种随机应变，能屈能伸，左右逢源，上下打点，反唇相讥，话中带刺，敢说敢做的本事，她曹七巧在姜家也就永远抬不起头来，就更要被人欺负和小看了。

显然，曹七巧的处世之道是复杂的，正如她的生活和经历是复杂的一样。但总的来说，曹七巧的处世之道是围绕着情和钱来行事的。一开始，曹七巧嫁到姜家是为了恋情，到后来变成了恋金。

与张爱玲笔下曹七巧的处世之道相比，西巫拉帕笔下的吉拉蒂的处世之道却是完全不同的。吉拉蒂的生活环境优越，不需要为生活而辛劳。她出身王室，生活圈子很小，很单纯，既不会像曹七巧那样要被人歧视，也不需要应付社会上各种人物。吉拉蒂的家教和生活环境把她培养成了一个大家闺秀、淑女和贵夫人的形象。她在待人接物上所接触的大都是上等人 and 富贵人家。因而知书达理，温文尔雅也就成了她主要的处世之道。

吉拉蒂的身世和家境，使她在待人接物和言谈举止方面都与其身份和教养相一致。王室的身世与良好的家教，让吉拉蒂在待人接物方面具有良好的礼节和礼貌得体的言谈举止。吉拉蒂没有在上等人家被歧视的精神压力，反之是在普通人眼里是属于高人一等的人；吉拉蒂不需要为钱为生活而奔波辛劳，反之她在物质生活上是无忧无虑。这种客观生活环境和家境方面的不同，也是导致作为“上等人”的吉拉蒂，与作为“下等人”的曹七巧在处世之道上明显不同的一个主要原因。

吉拉蒂主要是在王室贵族的圈子里生活，她从小接受着严格的王室贵族待人接物的礼节教育，在言行举止上中规中矩，知书达理。这与曹七巧的我行我素，不在乎自己的言谈举止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优越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吉拉蒂，在处世之道上不可能像曹七巧那样泼辣，不拘礼仪，口无遮拦，见风使舵，并具有反抗意识。

然而，不管是曹七巧还是吉拉蒂，她们各自不同的处世之道都是通过她们的爱情和婚姻生活这条主线而体现出来的。如果说张爱玲笔下曹七巧的处世之道是围绕着“情与金”来描写的，那么西巫拉帕笔下的吉拉蒂的处世之道就是围绕着“情与爱”而刻画的。两者的处世之道在一个“情”字上表现出了不同的话语，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心境，不同的行为举止和不同的心理状态。